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〇三期 ——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10b)

---

【人物春秋】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杜 超
【文革一页】李德生在安徽	姜毅然
【回首文革】“文革”中的焦菊隐	赵起扬
【追忆前辈】悼念王年一先生，学习王年一先生	毅 然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人物春秋】

### 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 杜 超 •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长期做党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中央局、华北局社会部长。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

1968年3月11日他以所谓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被拘留审查，关押达7年之久。中央专案三办于1975年10月27日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许建国受“四人帮”诬陷迫害拘留，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折磨成疾，于1977年10月4日含冤病逝。

#### ◇ 与江青的恩怨

1968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

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5名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而且这个方××也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于是他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竟粗暴地厉声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在地跟我们走。”

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

“喀嚓”，一副锒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

方××又大喝一声“带走！”4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处疾驶而去。

他们这是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呢？许建国心里暗暗揣度着。

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许建国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于是，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审查和批斗越来越超出常规，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有许建国一个人心里清楚。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所以任何人问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他的妻子方林和几个子女，他都永远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实在话长。

1937年12月，在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一个十分英武，留着大胡子、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谈话。这个大胡子正是许建国，他时年只有34岁，却已经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且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审干工作，而此次他审查的对象正是日后成为毛泽东夫人、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的江青。

当时的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就由许建国直接掌握。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进行汇报，可是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在实际中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像《红绣鞋》、《打渔杀家》她都十分卖力地演出，在鲁艺很出风头，是鲁艺的大名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江青本身并不喜欢京剧，但是因为毛主席很爱看京戏，为了想方设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江青也就多演京剧了。这是江青在同毛主席结婚以后自己在得意之中说出来的。

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她的网员工作自然完成得不好。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

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又还拖到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又远，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尤其是毛主席的关注。次数多了，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许建国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听了许建国的批评之后，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交给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许建国见她这个样子，以为江青真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反而感到不安和歉意，赶紧让夫人做些好菜留江青吃饭。但是江青反而更加卖力地参加京剧演出，许建国对她的这种行为反感乃至气愤，多次严厉地批评她。江青先是不理会，到后来竟然同许建国顶撞起来。

她说：“许科长，毛主席说过，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一个文艺革命者，积极参加演出是我的职责，这和完成网员的任务丝毫不冲突，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在当时严格强调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要求绝对服从和遵守的，下级同上级争辩是极其少有的事，更不用说像江青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公然顶撞许建国这样的老红军干部了。

为什么江青敢如此胆大妄为呢？原来这时候江青在出演京剧时已经结识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毛主席向中央保卫委员会提出要求和江青结婚时，许建国才知道。

在江青和毛泽东主席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第三次结下了怨。

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其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而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又必须要求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要求。这使她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妒嫉她。

许建国和江青的第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的边区党组书记，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此事天知地知，你就给我证明了算了。”许建国当即拂袖而起，正色道：“正因为你是毛主席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

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所以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毛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你说天知地知，怎么会是天知地知呢，至少你在上海了解你真实历史的同志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你在上海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之后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毛主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相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许建国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直接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

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

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毛主席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出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哲保身。但是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 ◇ 文革遭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以江青的个性，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早做准备。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些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旋涡，一些普通人的天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

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A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后来是许建国将他要到外交部工作。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A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式滚动式审讯。

两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建国的胳膊，将他的腰摠弯九十度，然后A对许建国主审。

A说：“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

许建国：“当时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还没有定为反党分子，他要我调查有关江青同志的匿名信，我当然要听从命令，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件事当时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去年，周总理向我询问此事，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A说：“你老实交代，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党员同志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率领着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和同志们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出来定性。

许建国当然不肯承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我是在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后，从监狱中救出来的，没有办任何出狱手续。”

A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还敢狡辩，许建国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诬陷你，你看这是什么！”

A将一份发黄的报纸甩到桌上，被摠成九十度的许建国看清那是一份1930年的《湖南清乡工报》，上载有《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正结案一览表》上第三栏写着杜理卿（注：即后来改名的许建国）3字，旁边注明“滕请自首”4个字。

许建国马上反问A：“你也曾跟着我干了多年公安保卫工作。你说说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能够作为直接物证吗？‘滕请自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我再次重申，我绝没有自首变节行为，这一点同狱的向仲华同志和江华同志都可以证明。”

A冷笑：“向仲华、江华，告诉你，这两个人中央也定了性，也是叛徒。许建国，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许建国说：“我工作中或许会有错误，但我绝没有罪，你说我是叛徒，这是诬陷。”

A勃然大怒：“胆大包天，顽固不化。”说完竟然冲过来，一拳接一拳地往许建国的腹部打，边打边狂叫：“你这个老家伙，看来不把你打死，你是不承认了！”A一动手，另两名大汉也跟着动手，不但用拳头，而且还用翻毛大皮鞋猛踢许建国的小腿。

许建国痛得抱着小腿在地上打滚，血顺着他的嘴角直往下流。但是3名打手没有丝毫的同

情心，依然打个不停。许建国痛得实在忍受不住，便叫道：“我交代，我交代。”

3名打手停了下来，得意地望着许建国。许建国擦去嘴角的鲜血，喊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许建国昏了过去。

这样的审查一直持续了3个月，但是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许建国始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最终江青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将许建国强行定罪。

#### ◇ 牢狱之灾

警车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下坡，再上坡，再向右拐。

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对北京地形的了解，被蒙着双眼的许建国渐渐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把他送到秦城监狱去！他的心不禁一阵凄苦，想不到他这样一个老公安战士，竟然会被关到自己人的监狱来了。

车停了，许建国被粗鲁地推下来，随即摘去了眼罩。果然，他的眼前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秦城监狱！

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罪行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长4米，宽1.5米）的牢房里，任何人都不能见。每天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的生活长达7年之久。

由于长期的迫害，许建国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反派规定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将近1米8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麻木了。又因为长久不与人接触，不能正常地讲话，致使他的喉咙发哑，险些失声。

尽管环境是如此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每天一起来，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里做自己设计的广播操，并且每天坚持在房间里走500圈。其余的时间便是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但始终毫无音讯。到了1968年底，方林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或农村插队。从1967年到1971年，许的家人都没有见过他。1971年9月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时方林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

1972年1月6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愤然离开了人世。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追悼会，之后，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看到已被打倒的外交部长又被毛泽东重新肯定，那么作为外交大使的许建国也应该有希望平反吧，方林的心中油然升起了希望。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其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取了批准，时隔4年多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的

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左腿还一瘸一瘸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放声大哭。反而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和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到了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同志的案头，这封信是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完信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邓小平和许建国从井冈山斗争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邓小平和卓琳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家人经常地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当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的非同小可的罪名，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7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经过邓小平努力，毛主席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

#### ◇ 还我清白

生活的环境在逐步好转，这让许建国及其家人感到高兴。但是许建国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长期的监禁生活，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让他经常整夜整夜的咳嗽，感到气憋胸闷。由于医疗条件差和技术落后，当时没能诊断出来，他已经得了肺癌。

尽管身体状况如此之差，但许建国依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之年，全国水灾、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六安地区也是地震警报频繁，形势十分紧张，家家户户在院内、街道路旁搭建防震棚，一有风吹草动就搞得人心惶惶。许建国对这种情况却另有分析，他认为地震就全国而言是有的，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果从政治上观察，可见另外一个问题：江青一伙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整人，乱中夺权。他主张做好干部群众的人心稳定工作，并借六安的历史、当地完好的古塔等古建筑来说明当地的地震不大。

许建国被秘密转移到六安地区时，实行的是“流放管制”，他在六安地区医院时也不准他讲自己的名字和来历，还说他是一个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就会越被认为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因此人们不但不排斥还非常信任他，叫他老红军，经常地去医院看望他，同他无话不谈。经过他分析地震传言之后，六安地区人民的心态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一连几天都没有睡，给党中央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的罪证的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平反的希望，渴盼着得到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权利！

然而，就在这时，许建国病情加重，由六安地区医院转到了省城合肥人民医院检查诊断，



他已是未分化型肺癌晚期，他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了！

震呆了的许建国家人，只能忍着悲痛，附和着医生的话，说“没事，是胸膜炎，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但实际上，几乎洞察一切的许建国心里明白，他忍着痛苦，反而来宽慰大家。终于有一天医院决定为许建国开始进行化疗。许建国严肃认真地对大家说，“这病我自己很清楚，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必担心，前些年是和‘四人帮’斗争，现在是和癌症斗争，要坚决斗争。”

许建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治疗期间他每天都要服很多药。这些药不仅量大，而且奇苦，许建国却风趣地说：“吃这么多药，都可以节省粮食了。”

干部病房里有的干部精神欠佳，长吁短叹，许建国就主动和他们谈心，“你的病算什么，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肺癌，化疗也过来了，我这不还挺好的嘛，得打起精神，你硬起来，病就软了，不要怕。”

只要体力稍有恢复，他就坚持到大阳台散步，和病友们摆龙门阵，谈笑风生。很多人都说，真看不出他是个癌症病人。

由于心态良好，经过两个疗程的化疗，许建国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精神也好了很多。

面对江青等人制造的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作为癌症病人，许建国更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他拿起了笔，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

他在申诉书上写道：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心声、向党提出的最后请求。

在送出了申诉书后的那夜，许建国因为激动与兴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不禁起身，吟出了发自内心的诗句：

昨夜沉思未成眠，革命生活忆当年。  
身患重病何时好，治疗诉书迎春天。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七言绝句，作于1977年3月7日。

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许建国的申诉当时没有得到回音。

在等待的同时，许建国积极配合外调组的工作，为外调组提供证明材料，一方面是关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一方面是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不管是对谁，许建国都知无不言，又实事求是。

有一次，有外调人员来找许建国调查上海市原副市长马天水的问题，说马天水已为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属敌我矛盾性质，现已被隔离审查，正在清算他的罪行，希望能够提供他历史上的问题，以利审查。外调人员想了解的是马天水在文革前就是否与江青有所勾结。

“不。”尽管马天水已经定性，但是许建国却没有胡编乱造落井下石，他仔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上调之前，马天水还没有同江青所勾结。因为当时马天水是书记处书记，而张春桥只是宣传部副部长，马天水无论资格还是别的都比张春桥高得多，但是那时张春桥就已经有意识地向江青靠拢，而江青也有意识地拉拢张春桥，两个人走得很近。张春桥很快当上了市委常委，马天水对此很不满意，还当着我的面发过牢骚，后来张春桥知道了，就告诉了江青。江青对马天水是有些不满的。”来外调的同志一边记录整理，一边失望地问：“那么说，他当时没有那些问题，证明材料可能没有多大用处？”

许建国说：“不管马天水现在如何，当时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这可不能随意去写，要尊重事实，这样才是真正帮助组织搞清问题，任何证明材料都要对党负责，对本人负责，对历史负责。”一席话让外调的同志对许建国敬佩不已。

1977年9月，许建国病情恶化，多次处于昏迷状态，他挂念着回音，嘴里时时喃喃道：“回音，回音。”

10月，许建国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已给家人开了“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时刻都可能终结，但他却死死地睁着双眼。

他在等，他在盼！

10月4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突然来人，他们带来了中央的审查结论！

许建国竟然兴奋得不可思议地坐了起来。按常理，像他这样垂危的病人，是根本不可能坐起来的！

来人面无表情地宣读审查结论，经中央三办对许建国的历史作出审查之后，得出结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这个结论犹如晴空突然响起了一声霹雳，将许建国及其家人的希望轰得粉碎，方林和孩子全部悲愤地叫起来，“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蓦地发出一声悲愤的叫声，倒了下去。

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老许！”“爸爸！”方林及其孩子全都扑到许建国的身上大哭起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公安部、外交部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宣布了为许建国彻底平反的决定。

□ 《文史精华》 2007年第8期

~~~~~

【文革一页】

李德生在安徽

• 姜毅然 •

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1930年2月参加红军，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交通队员、交通队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团长，晋冀鲁豫解放军及二野旅长、师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任十二军副军长、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从1967年8月率十二军进驻安徽“支左”起，到1969年奉调到中央工作，李德生主政安徽2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他制止了武斗，搞了“大联合”、“三结合”，建立了省及各市县革命委员会，不仅稳定了安徽的政治局势，还组织发展生产，使安徽省在动荡年代减少了一些损失。李德生在安徽所做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也得到了安徽人民的拥护，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 受命率部入皖

1967年，受上海一月夺权风潮的影响，安徽省的造反派们也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下面的市、县乃至公社，自然也未能幸免。但是，造反派夺权后，各派组织却没有实行“大联合”，更没有实行“三结合”，而是产生了矛盾，打起了派仗。在此情况下，中央当然不会批准造反派夺权，反而决定派军队代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把安徽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但是，由南京军区领导干部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到安徽后并没能解决问题，事态反而越来越严重。两大派组织由相互指责、攻击，发展到打人、抓人，后来竟发展到动刀动枪。中央为了稳定安徽，专门做出了以制止武斗为核心内容的5条决定。可是，中央的决定根本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武斗越演越烈。合肥、芜湖、安庆等城市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生产停顿了，社会秩序也乱了，群众人心惶惶。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工作能力强的李德生率十二军前往安徽实行“三支两军”，以稳定安徽局势。1967年7月底的一天，中央通知率军部驻扎在江苏淮阴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马上到北京接受重要任务。李德生飞赴北京后，立即被请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李富春、杨成武和他谈了话。周恩来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后，指示他立即率部进入安徽，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搞清楚情况，做好群众工作。总之，中心任务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最后，周恩来握着李德生的手说：十二军的任务紧迫、繁重，责任重大啊！

李德生回到十二军军部后，立即召开了十二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精神，提出到安徽后，十二军内部要保持团结，收拢部队。进驻安徽前，要做好思想、组织、物资准备。

1967年8月3日，李德生只带着几个参谋人员，来到合肥市，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

他一到合肥，就感到了气氛的紧张。大街上，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分别架起了高音喇叭，互相攻击，主要街道两旁的大楼上，窗户都用木板、沙袋堵塞，对立双方不断地相互抛掷石块，还不时地打冷枪，大街上行人稀少，市民不敢上街。当时，安徽省的党政机关已经瘫痪，领导干部大多数被关押起来，处境好一点的，也是“靠边站”，不管事了。原先进驻安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也由于受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处于瘫痪状态。

李德生见此情景，心中十分焦急，他命令十二军抓紧行进，尽快进驻安徽。驻扎在苏北的十二军接到命令后，于8月6日开拔，第二天，军部即进入合肥市。随后，下属各师陆续开进安徽省一些主要城市。十二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立下过赫赫战功。这样一支野战部队气势雄壮地开来，确实给造反派以一种威慑，也使安徽省人民看到了稳定的希望。造反派们决定先不动手武斗，看一看形势再说，可私下里仍然十分狂妄。他们认为，过去派来的军事管制委员会都没有管住他们，十二军来了照样管不住。因此，他们没有把李德生和十二军放在眼里。各造反派组织都打的是这样的主意：十二军支持我们，我们就拥护；十二军不支持我们，我们就冲击十二军，直到把十二军赶跑。

为了争取十二军的支持，各造反派都争先恐后地向十二军表示欢迎。8月7日，十二军军部和一部分先头部队进驻合肥市时，大街上贴出了许多大标语：“欢迎6408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来安徽支左！”“拥护6408部队对我们的支持！”这些标语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你们来是应该支持我们的，不支持，我们就不欢迎。李德生看出了造反派们的心思，在军部进驻合肥市的第二天，就在军部领导干部会议上说：这样一致欢迎的背后有文章，不那么简单。他要求部队内部首先要保持团结一致，到安徽后，先不要表态，要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后再决定部队的行动。

#### ◇ 冷对“揪坏人”

李德生率十二军军部和一部分先头部队刚刚到合肥，各造反派组织就向十二军提出要揪对方的“坏人”。原来，各造反派都有一些头目，也有一些“高参”，这些人是造反派组织的骨干。每个造反派组织都视对方的主要头目为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只要把对方头目打倒了，对方组织就会归到自己的大旗之下，自己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由于夺权以来几个月的相互“斗争”，各造反派组织都掌握了对对方头目的一些“罪行”，或者其他劣迹。但他们都不能说对方头目的造反行为不对，只能给对方头目扣上“坏人”的帽子，要搞倒搞臭他们。但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目手下都有一大批拥护者，他们要搞倒搞臭对方，很不容易。于是，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解放军的支持上。他们认定，只要解放军认为对方造反派组织头目是“坏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其揪出来“打倒”。李德生对此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对军部和部队先头部队负责人说：这是造反派组织给十二军出的第一张试卷。这时候马上表态，就会陷入派性斗争中。李德生要求十二军军部和先头部队指战员，要沉得住气，不表态，“冷对”造反派的要求。

于是，各造反派头目们来找先头部队的干部，当要求将对方“坏人”揪出来时，部队干部们就按照李德生的指示，只是听，也拿出小本子记一记，但就是不表态。造反派见不起效果，又分别交来对方“坏人”的一份份罪行材料，干部们收下材料，还是不表态。各造反派组织见此计不成，便展开了宣传战。他们纷纷架起了高音喇叭，互相攻击。这边如泣如诉地讲着“战友被害”经过，那边则声嘶力竭地要求揪出对方的“凶手”，吵得附近居民不得安宁。但十二军先头部队的干部仍然不为所动。这样冷静地对待造反派“揪坏人”的办法，使十二军避免陷入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纷争，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造反派也抓不住十二军所谓“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而造反派组织之间相互攻击、要求“揪坏人”的鼓动，在得不到解放军表态支持的情况下，时间一长，其劲头也就泄了。

### ◇ 坚决制止武斗

造反派见自己的要求得不到解放军的支持，便决定在十二军大部队进入合肥的路上搞一场武斗，以此将十二军拦在城外，逼迫十二军表态。李德生率部进入安徽，有一条原则是他始终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所以，他要求十二军指战员，遇到武斗，无论双方提出什么“理由”，都必须马上制止，在这一点上是不能犹豫的。

十二军大部队刚刚开到合肥南郊，就被造反派的“岗哨”挡住了去路，说是前边正在武斗，解放军不要开过去，免得误伤。李德生听说后表示，要坚决制止这场武斗。他命令部队迅速前进，直插武斗的两派组织之间，将两派人员分开。他要求指战员，如果遭到造反派的辱骂殴打，也必须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能开枪。如果造反派要求评理，也不表态，不带倾向性，不纠缠两派的具体是非。李德生一声令下，十二军的指战员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直插入两派武斗组织之间。武斗者见中间隔着解放军，怕伤了解放军而让对方抓住把柄，只好作罢。十二军趁势迅速开入市区。当市民们听说十二军没有被造反派挡在城外，顺利开入城内，并且制止了在南郊的一场武斗时，十分高兴，他们自发地在街道两边列队欢迎，燃放的鞭炮纸屑铺了一地。

造反派没有拦住解放军，心有不甘，决定第二天再搞一次大规模武斗，地点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这天一大早，双方就开始互相放枪对射，子弹在大街上横飞。他们还把几个大油桶灌满汽油，推到大楼下面，准备随时点燃。李德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3个连赶赴现场。战士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高呼制止武斗的口号，插到武斗两派之间。造反派怕打伤解放军，自己输了理，就不敢再开枪；李德生趁机命令部队迅速冲上对立两派的大楼，当即拆毁造反派用桌椅和沙袋修筑的工事，缴了他们的枪。

### ◇ 淮南“卧轨”

李德生到安徽后，平息了省会合肥的武斗，但另一个城市淮南的武斗却一触即发。淮南市的武斗主要是在煤矿中搞起来的。那里的两大对立造反派组织在夺权时发生矛盾，打了起来。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开着火车头去武斗。李德生指示驻淮南的部队，要把坚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放在工作第一位。部队进驻淮南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对造反派进行说服、劝导。但造反派不但不听，还冲击驻淮南的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部，接着，又策划开着火车头去武斗，逼解放军支持他们夺权。李德生得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既不伤害群众，又制止武斗。应该说，这是一个难题，大家想了许多办法，都觉得不妥。最后，还是李德生拍板：部队就卧在铁轨上，阻止武斗的火车开出去。他说，他们采取蛮办法，我们也要有一股狠劲，表示我们制止武斗的决心。部队一声令下，战士们齐齐地躺在铁轨上。解放军制止武斗的气势，使造反派受到震慑，再不敢往前开火车头了。指挥武斗的造反头目下令撤退，但一些造反派分子不同意撤退，其内部发生了分歧，争执起来。解放军趁机去做造反派组织中武斗者的工作，还做其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劝说武斗者放下武器。武斗队伍就这样被瓦解了，一个造反派头目还跑到合肥市去向解放军坦白交代。在这种形势下，李德生命令部队抓紧做工作，由部队领导和矿山领导干部带头，带领工人投入生产，还喊出了“要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的口号，淮南煤矿的生产很快就恢复了。

与淮南卧轨有相似之处的是十二军三十五师在屯溪的“卧路”。当时造反派开着汽车，沿着公路去武斗，李德生下令部队战士，高喊口号，躺在公路上。造反派不敢开车从解放军身上压过去，就向躺在公路上的战士耳朵边放枪，还动手打战士，想把战士吓走，但战士们就是不动，也不还手。这时，有许多群众围上来看，造反派只好把汽车开了回去。

### ◇ 芜湖“爬软梯”

李德生在安徽制止武斗，最危险的，要数在芜湖“爬软梯”那一次。当时，芜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那里的一些造反派认为委员会没有把他们“结合”进去，便把矛头指向了部队。他们冲击部队，打伤许多战士，还抢走了一些枪支。接着，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又打了起来。特别是占据芜湖电校大楼的造反派十分猖狂。他们占据大楼，向外打枪伤人，以此来威胁驻地的军代表，如果军代表不承认他们是左派，不将他们的头头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就对抗到底。还说，除非李德生军长来谈判，否则他们谁也不见。李德生得知这一情况，不顾众人的劝阻，决定自己亲自去一趟。

李德生到芜湖电校大楼时，只见大楼的窗户已经全部被造反派封死，只在二楼一个窗户上留了一个小口子，小口子伸出黑洞洞的枪口，两边大楼的墙上，到处都是弹痕。李德生的警卫员王楚林向楼上喊道：“我们的李军长来了，你们快把梯子放下来。”造反派听说李军长来了，便把一个梯子放下来。这是用竹杆临时做成的软梯，直接从窗户中放下，底下不着地，上边则钩在窗户框子上，人踩上去摇晃得十分厉害，稍不注意，登梯人就会摔下来。跟随李德生的作训参谋抢着要上，被李德生制止。李德生说：“你上去，他们发现不是我，你就有危险，还是我上。”言罢，他几步抢上前，登上了摇摇晃晃的软梯，快速向上爬。下边的人都为他担心，但他面不改色，沉着地一步一步爬到了窗口，一侧身，跳进了大楼。楼内的造反派见此情景，一时惊得呆住了。李德生进入楼内，在造反派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你们要我来，我来了。我是来批评你们的，你们抢枪、武斗，违反了中央的规定。你们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严重脱离了群众。你们违反中央指示，脱离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个我跟你们讲清楚了。毛主席讲，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大联合，你们却搞分裂。你们有什么权力抢枪、武斗、冲击部队？你们必须把武器交出来。你们一定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造反派原以为李德生不敢来，没想到，他不但来了，而且还迎着枪口爬他们的软梯，进入这座危险的大楼。而李德生义正辞严的话，更使他们无法反驳。一些跟着造反的人动摇了，纷纷放下武器。造反派头头感到孤立了，也放下了武器说：我们听李军长的！主动把武器交还部队。李德生离开大楼时，造反派自动站成一排欢送。接下来，李德生趁热打铁，接连到各造反派的据点做工作，严厉批评造反派头目，收缴武器。仅仅用了几天时间，芜湖的局势就稳定下来，生产、生活恢复正常。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李德生稳定芜湖的事后，对他十分赞赏。

### ◇ 收缴武器

让李德生最伤脑筋的是造反派手里有枪，有的还有火炮。这些武器都是在夺权过程中，从公安部门、民兵组织那里抢来的，有一些还是从地方驻军部队中抢来的。造反派手中有武器，互相射击，不断发生打死人和打伤人的事件；有了伤亡，就喊着要报仇，致使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李德生决心收缴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正好这时中央于1967年9月5日下达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李德生借此东风，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收缴造反派组织中的武器。他先是大量印刷中央命令，广泛散发，然后命令部队的宣传车上街去宣传中央精神。接着，派出小分队到造反派组织中去收缴武器。他下达命令：收缴时，先要讲清道理，如果造反派仍然拒绝交出武器，可以鸣枪警告，警告无效时，可以将拒绝交出武器的造反派坏头目逮捕法办。就这样，他们边宣传边收缴，用了3个月的时间，收缴了各种枪支2.9万余支，火炮290门，各种车辆51台，还有大量弹药。

李德生率十二军进驻安徽，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制止了武斗，稳定了安徽的混乱局势。中央肯定了李德生治理安徽的经验，并转发了介绍安徽经验的材料。

### ◇ 促成“大联合”

安徽的武斗被制止了，但各派组织仍然对立，摆在李德生面前新的任务是按中央精神，搞“大联合”。

在制止武斗的过程中，李德生先后十多次到安徽省两大造反派组织的总部去，做那些造反派头头的工作。在武斗被制止后，李德生把说服各派组织“大联合”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他经常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能认为干部都是走资派，其他群众组织都是保守派，只有你们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按你们的逻辑，天下还有好人吗？我们当年夺国民党的权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你们只靠少数人夺权，是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众组织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李德生讲得入情入理，一些造反派头目被说服了，但还是有一些造反派头目不服气。李德生把他们请来，谈起了家常，在谈家常中向他们讲明同是群众组织，不应该互相对立的道理。经过一番说理工作，又有一部分造反派头目被说服了。

推进“大联合”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解放军内部要保持一致。李德生认真分析了过去军管会失误的教训，得出一个结论：各造反派组织打派仗，重要根源是在“支左”的解放军内部有不同看法。造反派就利用这些不同看法，加剧分裂对立。李德生率十二军进入安徽后，特别对十二军内部强调，一定要保持意见统一，内部不能有分裂。在保持十二军内部统一之后，李德生还认识到，在安徽省的驻军中，除十二军外，还有原来就有的省军区，以及二炮某基地等部队。只有这些部队都和十二军步调一致，才能保持解放军内部的统一。于是，亲自到省军区、二炮某基地领导人家里去拜访，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谦虚地说：我们十二军到安徽来工作，是在你们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实际上是第二梯队。过去，安徽省军区和驻皖各部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三支两军”，也是做出了贡献的。今后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继续做好工作。之后，李德生在工作中，总是事先征求其他部队的意见，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使在安徽的解放军各部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这就使造反派没有了可乘之机。有了这个条件，“大联合”也就有了稳定可靠的基础。

可是，安徽的两大派组织已经对立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怨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搞“大联合”是不容易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无论对于哪一派，都不笼统地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不管哪一派，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

李德生亲自到两个大的对立派别总部去做工作。有的造反派组织头目主观地认为李德生是支持另一派的，见李德生来做工作，就不客气地接连质问李德生，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们？你们对我们的夺权怎么看？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对立面？你们屁股坐在了哪一边？面对如此尖刻的挑衅式质问，李德生毫不动气，他十分冷静地听着，并不反驳。待他们把话说完，再耐心地解释：我们十二军和安徽的所有驻军，都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对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一视同仁，做得对的，我们就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批评。希望你们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不要先下结论。还有的造反派组织主观地认为，十二军是会支持自己的，当李德生前来做工作时，他们就先搞一套颂扬词，对十二军大加称赞，还说，十二军到安徽省“支左”，是支持我们的，好得很。面对如此情况，李德生仍然十分冷静。他说：我们有那么好吗？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难免有缺点，有缺点欢迎你们批评指出。但你们有缺点，我们同样会不客气地批评指出。我们不会无原则地支持哪一派。我们对哪一派都一样，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我们批评你们，也是支持你们。李德生这样不偏不倚，使部队真正掌握了主动权。

在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后，李德生就趁势向对立的两大派组织派驻联络组。造反派头目认为联络组是来监视他们的，对联络组很是冷淡。李德生就指示联络组，要主动找造反组织头目和

群众谈心，他们有具体困难，就主动帮助解决。到两个对立派别中的联络组，对待双方始终平等公正，使两派都真正感到，解放军确实是一视同仁。从此，造反派组织之间再没有发生武斗，双方的关系也和缓下来。

为了把“大联合”落到实处，李德生又想了一个主意：办两个学习班，即分别办造反派头目学习班和领导干部学习班。他先着手办造反派头目学习班，把各造反派组织大大小小的头目全部集中起来学习。这有两个作用：一是使造反派组织群龙无首；二是教育造反派组织头目，让他们了解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指示精神，也使他们在学习班中缓和关系。造反派头目们听说解放军组织他们学习，都来了。趁此机会，李德生组织部队政治工作人员，给他们上大课，提高他们的认识；上大课之余，还开小会，解决他们之间的具体矛盾。通过这个方法，化解了许多矛盾。学习班一结束，两大派组织之间就产生了联合的意向。

李德生还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处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办领导干部学习班，实际上他是通过办这个学习班，把干部们保护起来，学习之后，立即“解放”。

为了实现“大联合”，并且为下一步实行“三结合”打基础，需要把两个学习班结合起来办。李德生的办法是，让进造反派头目学习班学习的人，在学习之后，检查一下自己对待革命干部的态度，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同时，也让进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人到造反派头目学习班上和他们交流思想，双方取得谅解。这样就为下一步“三结合”打下了基础。

1967年9月19日，安徽省两大派组织达成协议，成立安徽省大联合委员会。李德生知道，这才刚刚是个开始。他想出一个办法：搞联合大游行。于是，他找两大派组织头头多次商量，希望由两大派组织共同搞一次两派联合大游行，名称就叫“拥军爱民大游行”。9月20日上午，两大派组织各出10万人，分别排成4路纵队，携手游行。久受派仗斗争之苦的安徽广大群众非常高兴，他们放起了鞭炮，庆贺这次“大联合”。21日的《安徽日报》出版了特刊，发表了安徽对立的两大派“大联合”游行的报道和图片。在北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李德生把《安徽日报》特刊加印20万份，派专人送到北京，由中央转发给各省市，推广安徽省的经验。

#### ◇ 实现“三结合”

按照当时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中，旧的领导班子倒了之后，要搞一个“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代替旧班子。所谓“三结合”，就是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解放军代表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李德生把实现“三结合”看作是稳定安徽省的重大步骤，十分认真地加以对待。

李德生把实现“三结合”的重点工作放在了“解放”广大领导干部上。要实现“三结合”，还必须把已经被打成“走资派”的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之后，建立省以下的革命委员会就好办了。要“解放”省级领导干部，需要做很多工作。李德生抓住一条：毛主席说过，95%以上的领导干部是好的。对于造反派“揭发”的领导干部的问题，要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他指示，要抓一个典型，“解放”这个典型，就可以为下一步“解放”广大领导干部打好基础。他决定从“解放”安徽省委书记李任之入手。经过调查，造反派给李任之扣的“帽子”不少，但没有一个是政治错误和历史问题，只是工作中的缺点。他决定“解放”李任之，并以此为标杆，“解放”安徽省一级领导干部。通过迅速而细致的工作，安徽省一级领导干部大部分得到“解放”，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条件成熟了。



1968年4月10日，安徽省军管会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4月14日，中央批准同意，并任命李德生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20日，在合肥市举行成立“三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庆祝大会。庆祝大会后，合肥市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

#### ◇ 恢复生产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德生就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生产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安徽省工厂停工、矿山停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这种情况，李德生首先抓恢复生产，组织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不久，淮南、合肥、马鞍山等煤矿、钢铁生产基地都恢复了生产。鉴于军队干部没有抓地方生产的经验，他就把“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派到指挥生产的要害部门去，支持他们指挥和组织生产。

李德生在抓恢复生产过程中，特别注意抓重点企业。他要求省革委会要重抓淮南、淮北的煤矿，抓合肥、马鞍山的钢铁厂，抓铜陵的铜矿，抓芜湖的造纸厂，必须保证生产不停顿，还要每年增产。他还组织力量，新建了安庆石油化工厂，这是安徽历史上的第一个石油化工厂。

李德生对农业生产也没有放松。在农业上，他主要是抓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不久，安徽省的农业生产也恢复起来，产量逐年提高。为了使农产品能够运出去，李德生报经国务院批准，修建了阜阳到濉溪的200多公里铁路，还修了100多公里的山区公路，改善了皖北农产品运输的状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德生主政安徽，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但经过他的积极工作，安徽省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和破坏，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生产，因此，李德生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肯定。

1968年10月，李德生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开幕式上主动问：“哪个叫李德生？”并和李德生亲切交谈，肯定地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李德生到中央工作。虽然之后他仍然兼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多次回到安徽省检查工作，但他这时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了，其主政安徽省的工作至此基本结束。

□ 《党史纵览》 2007年第7期

~~~~~

#### 【回首文革】

##### “文革”中的焦菊隐

• 赵起扬 •

1975年2月28日，焦先生悄悄地、冷清清地走了。没有发讣告，没有组织大家向遗体告别，没有开追悼会。他悲凉地戴着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离开剧院。他一生导演了许多戏，时代导演了他悲剧的一生。

听说剧院得到他即将死亡的通知后，军宣队和个别领导成员来到病房，他们像牧师最后一次给垂危病人祈祷似的想超度他的灵魂，不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焦菊隐，你还

有什么话对组织交代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去承认自己反动的罪行。更有甚者，剧院通知家属，不许给焦菊隐穿衣服，只能用一张床单包起来去火化，骨灰盒也只能买七元钱一个的，而且骨灰盒只能放在八宝山的地下室。这做得太过分了，太无情了。

关于焦菊隐的政治历史问题，1952年人艺建院时就有了他在国立剧专国民党区分部选举时，他当选区分部委员的材料。北京市委根据党的政策，对民主人士（焦菊隐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这类问题持慎重态度，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向焦提出过这个问题。

“文革”中，军宣队在一次全院大会上，把这个材料拍在桌子上要他承认，焦却平静地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件事情。这就成了对他批判审查的大事情。

焦菊隐在病中很痛苦地说：“连我自己也糊涂了，为什么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尽管他是带着蒙冤的遗恨而去，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心地是清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艺党委做了大量的调查，曾向剧专在江安期间与焦共过事的20多人（包括校长余上沅）进行访问，对证核实。大量材料说明：焦于1942年在江安剧专期间除根据当时国民党的规定：凡在剧专任教授者，必须参加国民党。焦菊隐除被迫填写了参加国民党的表格外，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有些材料证明，焦菊隐当时的政治态度是倾向进步的，是受国民党监视的。如1945年10月，他写了一篇《自由大学》，刊登在国统区《新华日报》上，内容是反对反动势力干涉学校教育。至于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以后，无论在戏剧活动方面，还是1948年由他倡议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抗议国民党逮捕师范大学八名同学的正义活动上，以及最后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离开北平投向解放区石家庄，都可以说明焦菊隐进步的政治态度。

我与焦先生在北京人艺共事22年。但真正地、全面地、深刻地了解他，那还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这场十年浩劫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又被打成“北京市文化艺术界复辟回潮的代表人物”，他就自然地被打成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文革”中，凡是被造反派列为批斗对象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被关进“牛棚”，实行“三同”加“一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批斗。凡进牛棚的人，一切自由也就随之消失了。大家长时间被关在一起，彼此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焦菊隐在“文革”中沉默寡言，即使我们在休息中谈一些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也言语不多。

“文革”初期，焦菊隐为他的大女儿宏宏的生日写了一封祝贺信（此信是在“文革”后发现的），其中只有四句话，大意是：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将来还要做导演的，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买生日礼物，希望你一定要努力学习。这封信，头两句话好像是发表了两点声明，但重要的是他告诉下一代，让女儿相信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第二层意思是让女儿相信他在这场运动中能够挺得住，不会悲观绝望，而且还要继续做导演。因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导演、排戏，就是在中国话剧艺术这块土壤上搞出点真名堂，为中国话剧事业扬眉吐气。

他在这群“黑帮”中是年龄最大的。“文革”那一年，我48岁，他已62岁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脚和小腿一直浮肿，而且还患有视网膜脱离，视力很差。尽管如此，不论是在批斗会上做“喷气式”，或被连续批斗站五个小时，或劳动时抬200斤重的垃圾箱，或两个人

到郊区一上午装满一汽车沙子等等重劳动，他都毫不含糊地干得很出色。除了我听说他在青少年时受过苦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甘落后，每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求自己做好。在劳动中即使有些困难，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就连他自洗的衣服，也从来都是晾干、叠平放在身子下边，使之平整不皱。再如各单位都进行“拉练”，北京人艺组织全体人员，打起背包，从北京出发到顺义、平谷行程500里，他没有叫苦，也没有要求别人照顾。这就是焦菊隐的性格。

根据他平时慎重的工作态度，原以为他的沉默寡言会持续下去，其实不然。大概是在1971年，人艺全体人员被下放到郊区团河进行劳动锻炼，从育秧、种稻开始到收割全过程都要参加。每两周回城休息两天，每次都留下四五个干部留守看管稻田。这次轮到焦菊隐留守了，晚饭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正巧看的是《红灯记》。看片中，他忽然感慨地说：“我在北平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不能全给否了，你们看样板戏中不少都是德、和、金、玉班的，我为京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的确，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据我所知，像傅德盛、宋德珠、李和曾、王和霖、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侯玉兰、陈永玲、高玉倩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演员。《红灯记》中就有三位，一位是演李母的高玉倩，一位是为《红灯记》作曲的李金泉，还有一位是鼓师耿金群。后来我听到他的这一番感慨和自我辩白简直不可想像，他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是自己送上门让人家进行批判吗？但不知此时此刻他为什么非发表这样的感慨不可呢？实在不能理解。可能是“文革”开始以来，把过去他为国家做出的那些成绩都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对这一笔抹煞，他是不服气、不平的。特别是中华戏曲学校是他创办的，为改革京剧旧科班的弊端，为改革旧课程，他曾受到戏曲界保守派的打击而被迫走国外，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把事情颠倒了，他觉得受到极大的委屈，怀有很大的愤懑，他隐忍四五年都没有向谁表述过。也许这天晚上他触景生情，当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样板戏”中出现时，他就情动于衷地把他想要说的话一下子发泄出来了。当时虽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但还是送给他两顶帽子：一是为30年代翻案；二是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翻案。

1964年，依江青指令，北京人艺和北京京剧院按原样重演《智取威虎山》。这一举动的背景是：上海京剧院第一稿《智取威虎山》来北京参加现代戏会演，受到评论界的批评，江青很生气，就叫北京人艺和北京京剧院同时演出这一题材的两出戏，说是：“叫大家比较比较，看上海的戏好在哪里……”此时从院外传来一条小道消息，说《智》剧要受批判。我们没有管这些，对上演这个戏我们是认真对待的。焦菊隐是《智》剧的导演，我和焦菊隐一块到剧组动员，要求按原样演出，不改一句台词，不改一个动作，听听不同意见有好处，还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一定要保证把戏演好。戏演完了，事情也过去了，但在“文革”中，这却成了北京人艺一大罪状，说这次演出是有意反对江青；反对京剧现代戏；说什么八大金钢占据舞台中心；群魔乱舞；歪曲解放军形象等等。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在焦菊隐参加的一次小组会上进行了批判。军、工宣队参加了这次会议。焦菊隐解释这不是阴谋，也不是反对谁，是奉命演出。这当然满足不了当时那种无限上纲者的要求，指责他是包庇黑线，包庇旧党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工宣队员甚至口吐脏话侮辱他是“耍死狗”。他受不了这种人格侮辱，以后他就再也不回答问题了。在这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以势压人的气氛下，焦菊隐没有跟着上纲，没有昧了良心拿艺术去做政治交易。他除去说明当时的真相以外，不多说一句话。

1972年，在全院大会上宣布成立三人领导小组，但没有说谁是小组长或负责人，只是说了一句由赵起扬多抓点工作。于是赵起扬被大家称为“赵多抓”了。会后焦菊隐悄悄地对一个演员说：“起扬同志又要抓创作了，以后我就有戏可排了。”这个时期确实是抓起创作来了。剧院全体艺术干部都下去进行创作，组织了五个组搞多幕剧，近十个组搞独幕剧。已经六年没有演戏了，演员们如饥似渴地想上舞台，想演戏，没有剧本不行。所以大家对搞创作都很积极，连曹禺同志都动情了，他提出要写《巴黎公社》，把于是之、英若诚调去做助手。剧院真正热闹起来了。

焦菊隐在这一段时间的精神比较好，因为中央有一个文件，其中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一批二用三养”。因此那时的当权者对他的专政不像以前那样严了。有些胆子比较大的艺术干部还敢到他那间又潮又暗的小屋去聊天，请他给讲点什么东西。如方 Unfixed Problem here?Unfixed problem in this line 德的女儿请他教英语，王志安同志请他讲授导演。不管是谁，凡是对他有要求的，他都热情对待，认真讲授。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剧院新创作的多幕剧《云泉战歌》进行连排了，军宣队通知焦菊隐可以来看戏。这是焦菊隐自“文革”以来第一次被允许可以参加艺术活动。

“文革”中和焦菊隐接触最多的一位演员得知要焦去看连排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他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不希望焦去看连排。焦问为什么？他说，形势和政策都是在不断地变化，今天说要用你，明天可能一脚把你踢开。焦则表示，已通知我去看连排，而且已经答应了，不去是不礼貌的。这位演员说，如果你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你选择：一是看完戏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你的辫子，顶多说你不积极；二是净讲好话，一个字也不要批评，他们顶多说你有顾虑，不诚恳；第三种办法是凭着你的认识水平和艺术水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不希望你选择第三条。因为这条办法的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暂时不批，也会记你一笔账，随时都可敲打你。

焦听完这位演员非常周到的思考之后，没有讲话，只是看着他笑了一笑。这位演员猜不出这一笑是什么意思，不知焦选的是哪种办法。但一直为焦担心。

第二天，焦为看这次连排，还郑重其事地整了装束，虽然穿了一件半旧的灰制服，但干干净净，平平整整，裤线棱角分明，头发梳得整齐黑亮，人特别见精神。他是很认真对待这次看连排的，给人一种俨然像是昔日人艺总导演的神气。他不紧不慢迈开方步登上三楼大排练厅。看到军宣队没有招呼他坐在前几排，便很自觉地走到最后一排，和演员们坐在一起。

连排结束了，没有请他参加讨论，第二天军宣队派人去问焦菊隐，让他谈观后感，他没有提一条具体意见，只说了十四个大字：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

对焦的访问记，很快地登在了剧院的十三号简报上。那位关心焦菊隐的演员看了简报后焦急万分，见了焦就说：焦先生，你捅了大漏子了，三种办法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最坏的一种呢？焦很平静地说：我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的良心办事的，你跟我排过不少戏，你应该了解我，我知道你的意见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军宣队对他的意见尽管很恼火，但当时并未对他进行批判，可是这笔账已经给他记下了。

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进入高潮的时候，也就是在北京展览馆有北京市文化艺术界参加的“批判赵起扬进行黑线复辟回潮”的大会上，点了焦菊隐的名，连他“为30年代翻案”，“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翻案”的账一块儿算，说他“反对新生事物”，说他讲《云泉战歌》政治上刚及格是假，艺术上只给二十分是真，说他是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等等。

焦菊隐对《云泉战歌》的评语，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艺术上的发言，也是他在政治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一场战斗性的发言。对于“四人帮”在文艺上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文化专制是一次严重的挑战。

当“批林批孔”逐渐深入的时候，特别是焦菊隐已经知道这次“批林批孔”主要是批“周公”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命运感到担心，他觉得自己的前途暗淡了。他对一位演员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也不能再做导演了。”他的精神崩溃了。

从此，他的情绪一直不好，不久就住进医院，诊断为肺癌，已无法做手术。尽管医生瞒着他，但他懂外文，从床栏上的病卡上，他明白自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他要求把大女儿焦世宏从陕西调回来。费了很多周折，宏宏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对女儿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比斯坦尼都写得多，可惜都是交代问题的材料。我要去了，没有别的东西可留，但还有一些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把我说的都记下来，这要难为你了，孩子！

宏宏听了父亲的话，心如刀绞，难过万分，想说几句安慰父亲的话，但已泣不成声。

宏宏虽然已做好了记录的准备，但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反应强烈，病情随之不断恶化，他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在离开人世之前，惟一一点珍贵的希望也没能够实现。终于，在1975年2月28日含恨而去。

焦菊隐有许多理想都没有实现。据我所知（当然只是极小一部分），如他对于话剧民族化的理论只写出一篇提纲。太可惜了，这是一篇影响戏剧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又如他很早就想排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哈姆雷特》。解放前在北平，他就曾用京剧的形式演出过《铸情记》（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尽管他的这种精神在人艺的许多外国剧目中也有所反映，但总是没能由他自己排演而总结出一套经验来。再如，他很早就想把《白毛女》改编成话剧，构思已经比较成熟了，他要原歌剧后半部作重大修改，他要把喜儿这个人物一直贯穿到底。还有，他不仅要继续进行像《虎符》那样的民族化实验，而且还想对西洋话剧的各种流派做实验，来滋润丰富中国话剧，使中国话剧能扬眉于天下。

他热爱戏剧事业胜于爱惜自己的生命。他在艺术创造上那种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忘我精神和为中国话剧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人们都说他创造了人艺的艺术风格，可他自己的生命也成了这艺术的祭品。

他的艺德如何，院外人还不太知道，院内的老同志却非常清楚。他排戏虽然要求极为严格，但从从不独断专行，有困难总是和大家商量，演员们公认他是最能启发人们创造角色的导演，最能发挥演员艺术创造力的导演。他在和演员合作中，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甚至个别演员在几个戏中与他合作都爱争论，别人建议这个戏就不要再让这个演员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从该戏的整体出发，她是全体演员中担任这个角色最理想的人选。

焦菊隐生前，人们对他的传说很多，褒贬不一。通过多年的接触以及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考验中，我觉得虽然他也有缺点，但他一生的主流是热爱祖国，热爱艺术并忠于艺术的。他对于中国民族艺术有精辟的解析，他对话剧建设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个宁愿抛弃在国外当教授的安逸生活而回国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爱国者，而且是尽其所有报效祖国文化戏剧事业的痴情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的艺术家的，就在他临去世前政治上得不到正确结论的时候，他竟能撇开这不公正的对待，要把应留给后人的宝贵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傲骨与忠贞的品格；体现出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心疲力竭地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奉献精神。

谁能想到，北京人艺创建人之一，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翻译家，北京人艺艺术风格的带头人，“中国话剧学派”的探索者，戏剧界一颗灿烂、光辉的巨星，竟是这样冷漠凄凉地殒落

了。这对北京人艺和中国戏剧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享受到人们真正对他的崇敬。

我从心底深深地敬仰他，怀念他。

（作者系文化部原副部长、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 《纵横》 2005年第12期

~~~~~

# 【追忆前辈】

悼念王年一先生，学习王年一先生

• 毅然 •

王年一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使我们格外地悲痛和震惊。他的离开又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九月十三日，更令人不胜唏嘘。

王年一先生以一本文革史巨著《大动乱的年代》，坚挺地站立在文革史研究的领先地位，而且几十年不动摇，绝不是偶然的。这本书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当时，河南人民出版社要组织一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丛书，可是，关于文革的这一本迟迟找不到人写。众所周知，文革研究是个大禁区，人们只能按照《历史决议》定下的框框解释，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疑问都不允许提出。这本书实在太难写了。王年一先生知道后，毅然决然，自报奋勇，挑起了这付重担。当时，他有教学任务在身，所以，只能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开始工作，写到七点多钟，匆匆吃点早饭，就去上班，下班后再继续写到深夜。结果，他最后拿到的任务，却第一个交出稿子，前后只用了四个月。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勇敢地打破了许多禁区，旗帜鲜明，根据充分，论证周密，文字严谨。全书没有道听途说，没有唯上唯书，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根据事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因此，此书一出立刻引起轰动，成为文革研究者、党史研究者和所有关心文革的人们的必读书。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作者的丰厚的史识，高尚的史德，特别是他的过人的胆识，也就是史学工作者最缺少、因而最可贵的史胆。

王年一先生的过人的史识、史德和史胆，还表现在他对林彪事件的态度上。发生于文革期间的林彪事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文革史，以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都占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几十年来，它都是一个说不得、碰不得的问题。然而，王年一先生却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林彪大声疾呼，写出一篇篇有理有据的文章，痛斥种种谬论和谎言，澄清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

一般专家学者共同具有的优点，如作风严谨，孜孜不倦，生活简朴，待人和蔼，毫无架子，王年一先生一概具备。但是，像王年一先生这样具有过人史胆的人，在史学界，可谓凤毛麟角。所以，王年一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当今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王年一先生只有七十五岁，这在现代是算不上高寿的。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早、这么快？这是值得人们探究的一个问题。当然，他是因为生病而逝世。但是，这个原因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承受了一种特殊的压力。这些年来，王年一先生完全在宪法和党章的范围内，以病残之躯，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应该加以保护和鼓励的。可是，

某些人完全不这样看，他们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利用手中的权力，向王年一先生施加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可怕的压力，成为了促使王年一先生过早地逝去的重要原因。禁书、禁报、禁网、禁声，这是某些人的事业。但是，必须明白，你们“禁”的力量再大，在亿万人民群众面前，必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要阻挡，必将成为齑粉。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